

台灣的個案研究

——後儒學文化中的民主探索

● 金耀基

在過去三十年裏，台灣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顯著成就。台灣成功地擠入了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同南韓、香港和新加坡並稱為「東亞四小龍」，其進步之神速，令世人矚目。

毫不奇怪，台灣的經濟騰飛引起了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的廣泛注意，他們或基於深厚的理論根柢，或基於翔實的經驗材料對此提出了大量可能的解釋。大體說來，有兩派不同的觀點，一派從制度上立論，另一派則從文化上立論。持有這兩種不同觀點的人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結構與文化何者更為重要這一問題上^①。特別有趣的是，文化論者提出了一個後儒學的論點。簡單說來，文化論者認為，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騰飛的推動力量正是儒家倫理^②。顯然，這一後儒學的論點同韋伯對儒學的分析正好是針鋒相對的。在韋伯看

來，儒家的理性主義是一種「講究秩序的理性主義」，它不可能推動社會或社會經濟的深刻變革。

長期以來，韋伯的觀點一直都被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當作一個權威依據，以此去解釋中國何以未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現在，由於台灣經濟騰飛這一經驗事實，許多具有儒家傾向的學者自然就會對韋伯所說的儒學是一個消極的文化系統這一斷言提出質疑^③。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探討儒家思想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④，我們所關心的是儒家思想作為一個政治文化系統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個時期以來，絕大多數學者（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都把儒家思想視為一個完全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並為綿延達數千年之久的專制制度提供合法化依據的價值體系。儘管

在韋伯看來，儒家的理性主義是一種「講究秩序的理性主義」，它不可能推動社會或社會經濟的深刻變革。現在，由於台灣經濟騰飛這一經驗事實，許多具有儒家傾向的學者自然就會對韋伯所說的儒學是一個消極的文化系統這一斷言提出質疑。

* 本文的修改得益於 Dr. Ramon Myers 和 Dr. Larry Diamond 的意見。我特別要感謝 Dr. Larry Diamond 所提出的建設性意見。

台灣的經濟獲得了奇迹般的發展，但其政治制度一般則被歸入威權型一類，大凡研究台灣現代化的學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台灣的政治發展落在經濟發展的後面。然而自70年代後期以來，尤其是在最近幾年中，台灣明顯地開始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⑤。台灣目前實行一種廣泛而有有意義的競選制度，通過定期選舉產生出政府官員：一個名符其實的反對黨業已成立；相當廣泛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遊行和罷工自由等等業已成為政治生活的一般特徵。在蔣經國這位卡里斯瑪型領袖人物於1988年1月13日去世後，權力交接也異常平緩，這標誌着台灣的立憲政治明顯地走向了制度化。所有這些無疑都表明，台灣已經永久性地同傳統的王權政治分道揚鑣了，如今已明顯地開始步入民主的軌道。應當承認，台灣的命運，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前景仍有曖昧之處，但是台灣的民主轉型卻是一個饒有興味的问题，我們有必要對它作出解釋。

現代化理論和民主政治

現代化理論在50、60年代一度成為主導性的社會科學典範，時至70、80年代，這類理論即使不是受到了質疑的話，也已經不再時興了。近年來，依附性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引起了眾多關注不發達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的學者的廣泛注意^⑥。但是，同依附性理論的論點相反，亞洲在最近幾十年裏經歷的是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發展而不是停滯 (underdevelopment)，亞洲各國的領導人和知識分

子正在有目的、有意識地大力推進現代化。在「四人幫」垮台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78年開始實施四個現代化的規劃，力圖使國家擺脫貧困和不發達的狀況。白魯恂說得很有道理：「現代化理論同亞洲的發展歷程有着密切的經驗關係，但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歷程就沒有這種關係了。」^⑦

早期的現代化理論暗含着這樣一個論點：即作為啟蒙之遺產的理性取得了凱旋式的勝利，這類理論無疑帶有一種樂觀主義的音調。但是，那些思想精深的現代化論者從不天真地以為民主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民主政治並非現代化的論題中必有之義^⑧。阿爾蒙德(Almond)告誡我們說，「現代化可能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邁進，但也同樣可能朝着威權政治的方向邁進。」他明確地反對擴散論者所提出的單向發展這一簡單化的概念^⑨。韋伯作為第一位偉大的現代化理論家，充分地意識到理性化的悖論，他對民主政治持有一種矛盾的——如果不是悲觀的話——態度^⑩。

的確，「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精英們所關注的主要是經濟發展的問題。研究現代化問題的學者們經常都有這樣一個傾向，就是接受自由、民主的觀點，把民主和多元化看成內在的好的東西。一個規範的政治發展理論多半都會把民主政治包含在現代化的定義之中。更為重要的是，現代化理論雖不去討論自由、民主發展的前因後果，但卻認定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存在着經驗性的關聯。

不過，正如魯斯托(Dankwart Rustow)所指出的，社會經濟要素與政治民主之間的經驗性關聯並不意味着兩者之間存在着一種因果聯繫，同

同依附性理論的論點相反，亞洲在最近幾十年裏經歷的是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發展而不是停滯，亞洲各國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正在有目的、有意識地大力推進現代化。

樣，功能解釋也不能當作一種發生學解釋。總而言之，它們並不說明「民主制度是如何產生的」^⑩。

就台灣的情況來說，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深刻變化產生出種種結構性力量，影響着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不僅如此，由於工業化的結果，特別是由於教育的迅速普及，儒家的政治文化似乎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一種新興的政治文化無疑有助於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而此種政治文化，正如本文在後面將要闡明的，表現出了阿爾蒙德和維爾伯(Verba)所說的「公民文化」的某些特徵。但是台灣的民主化並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自發的結果。台灣的民主化過渡有點類似於西班牙的情況，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此一民主化過渡，那就需要對過渡過程本身進行分析^⑪。

黨國體系及其合法性

台灣政治制度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一黨統治。國民黨自1949年自大陸退守台灣以來一直都享有統治權。儘管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主義黨享有合法地位，但台灣的政權一直都壟斷在國民黨手中。在國民黨統治下，政府的結構和運作方式同在大陸時期基本上是一樣的。國民黨將其全國一級的黨和政府的全部機構集中於一個小省，該省僅佔中國總面積的0.37%和總人口的1%。全國、省、縣、市和地區各級都設立相應的黨政機構，以確保穩固的一黨統治^⑫。

國民黨於1924年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被改組成一個列寧主義式的政黨，但國民黨僅只在組織結構上成了一個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它有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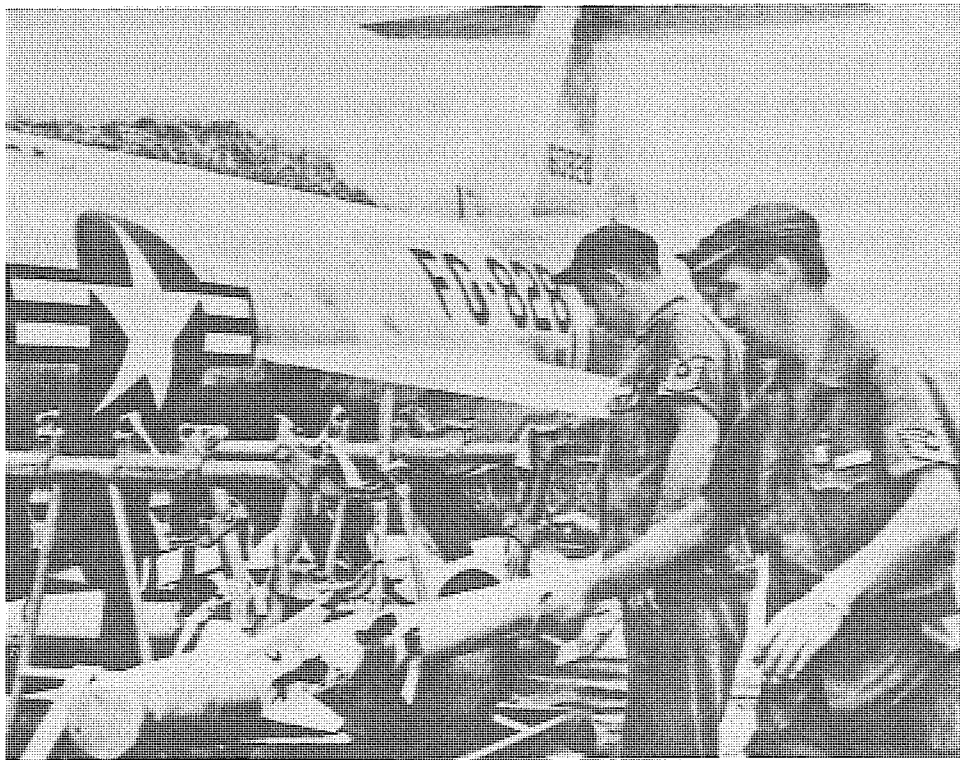
一套意識形態，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主、民生)。孫中山提出建國方略分三步驟實行，首先是實施軍事統治，然後是進行民主教育，最後是建立立憲民主制。國民黨和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根本區別在於，國民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從來不想對社會實施全面控制。台灣的黨國，用墨子刻(T. Metzger)的概念來說，是一個「受到抑制的」政治中心^⑬。國民黨最終的建國目標是要創立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這至少是三民主義的理論立場，而三民主義對於執政黨在台灣的實踐有着深刻的影響。

與孫的民主教育的思想相適應，國民黨於1946年頒佈了一部新憲法。但是，新憲法的頒佈並未使中國進入立憲政治的時代。那時國民黨同中共正在進行一場空前規模的內戰。在內戰的硝煙中，國民大會一屆一次會議於1949年在南京召開，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這次會議還依照憲法修改的程序通過了「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剛一建立起統治，即於1949年宣佈了戒嚴法，把對政治及其他權利——包括組建新政黨的權利——的限制建立在防止共產黨的顛覆威脅而採取的必要措施的理由上。

國民黨於50年代主要致力於國家安全問題，因為共產黨的軍事入侵似乎迫在眉睫，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在1949、1954和1958年國共兩個政權曾經有過幾次軍事對抗。從50年代中期起，台灣開始接受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而且，美國還承諾幫助台灣防止共產黨的進攻，這給了國民黨以喘息的機會，使其能夠致力於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雖然蔣介石

台灣的經濟發展影響着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新興的政治文化也無疑有助於台灣的民主發展，但台灣的民主化並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自發的結果。

從50年代中期起，台灣開始接受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圖為美國空軍人員正在台灣機場安裝響尾蛇式導彈。



領導下的國民黨人從未喪失反攻大陸的希望，但在50年代初期，他們的戰略卻發生了決定性的轉移，他們要把台灣建成全中國的一個模範省。

國民黨開始實施土地改革的發展規劃，實施此項規劃不光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或許更多地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⑬。整個土地改革過程是和平的，沒有發生任何流血事件，其結果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具有深遠的意義。一方面，台灣創立了當時在整個亞洲都算最為合理的農業格局，另一方面，它無疑也加強了全島的社會政治穩定。台灣的地主把自己的土地讓出來，從政府債券中獲得補償，他們利用手中握有的債券作為資本投到工業生產中去，推動了台灣最初幾個階段的工業化進程，形成了一個企業家階層。在以後的若干年中，國民黨政府不失時機地在保守的官僚體制外部建立起新的機構以指導資本主義的發展。總統蔣介石和副總統陳

誠認識到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倒台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經濟的崩潰，於是他們便把操縱經濟命脈的大權交給了一批受過西式訓練的技術官僚。的確，像尹仲容（他是一位受過美式訓練的電機工程師）和李國鼎這樣一批人實際上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能夠自由地設計和實施台灣的經濟計劃^⑭。美國也通過美援機構(AID)對台灣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美國支持那些主要受過美式訓練的現代化技術官僚們去實施他們的經濟發展規劃。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台灣的經濟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得到了高層領導人不懈支持的技術官僚們造就出來的。經濟越是發展，技術官僚就越是捲入到國家事務中去。結果，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都日漸呈現出生機，在此一過程中，黨國的權力沒有受到絲毫的威脅。而且，台灣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就在於「經濟從政治中分離了出來」^⑮。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國民

台灣的經濟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得到了高層領導人不懈支持的技術官僚們造就出來的。經濟越是發展，技術官僚就越是捲入到國家事務中去。結果，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都日漸呈現出生機。

黨的合法性日益取決於它能否保證經濟的發展與增長。根據70年代和80年代舉行的六次選舉結果來看，國民黨每次都贏得了大約70%的選票，較之非國民黨選民，國民黨選民一般都受過更好的教育，職業地位也更高些，收入大多居中上水平。此外，就選民對政府政策的態度來說，78.7%的選民都對生活質素表示滿意^⑮。人民對國民黨統治所作的積極反應更加強了黨的以發展為目標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工業化不僅創造出了財富，而且還成功地越過了所謂的「庫斯奈特陷阱」(按照「庫斯奈特陷阱」的理論，在工業增長的初期，不平等會不斷地增長)。在台灣，收入分配之公平合理可謂史無前例，收入不平均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從1953年的0.6206下降到1972年的0.2955，1979年又進一步下降到0.2806^⑯。

政治和經濟的分離

經濟從政治中分離出來，這使台灣呈現出雙重形象。一方面，台灣被普遍稱譽為一個進步國家，它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具有活力的經濟形態之一；另一方面，台灣又被視為一個僵化的政權，它的領導人抗拒變革^⑰。例如，雅各比(Neil Jacoby)就認為，「與飛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相反，台灣在1951到1965年期間在政治結構方面幾乎沒有甚麼變化。」^⑱就台灣政權的形式結構而言，雅各比在1966年所作的上述觀察是無可置辯的。當然，在這段時間裏，尤其是在60年代以後，台灣在僵化外表的背後也發生過一些政治變化，而這些變化也並非無足輕重的。但是，台灣政治體制的僵

化形象一直持續到70年代才開始有所改變。

台灣政治體制的僵滯可以歸結為幾個主要原因。首先，如上文所提到的，政府的機構組織和運作方式幾乎沒有任何變化，自1949年退守台灣以來，政府的基本格局一直都保持不變。第二，國民黨自命為中華文化的維護者，秉持着一種堅決反共的立場。多年來，國民黨的這類官方宣稱連同其政治意識形態一直都保持不變。第三，蔣介石的去世(1975年)並未造成明顯可見的變化，他的權威由其子蔣經國接替^⑳，更使人有帝制中國時代的王位繼承的聯想。

當然，這一形象只是表面的，不足以反映60、70年代台灣政治上所發生的實質性變化。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國民黨並未放鬆對政治自由，包括言論、新聞和結社自由的限制。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一份有影響的政治刊物)編輯雷震試圖組建一個反對黨，結果被指控在其編輯部內窩藏一名共產黨間諜而處以十年有期徒刑^㉑。在60年代，有幾個人由於主張台獨而遭逮捕，其中包括彭明敏博士，他是一位知名的法學家，也是當時被新聞界報道得最多的一個^㉒。在台灣，誰要反對領導人，組建新的反對黨，或主張分裂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會遭到嚴厲的壓制。就這些方面而言，台灣的政治制度誠可以歸入威權型一類。而國民黨若欲成功地抵制對其政治權威的挑戰，就只能靠切切實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

經濟從政治中分離出來，這在所謂的「大陸派」與「台灣派」之間造成了異乎尋常的權力分配格局。在台灣的2,000萬人口中，15%(約300萬)是1945年後遷來台灣的大陸人或其後

經濟從政治中分離出來，這使台灣呈現出雙重形象。一方面，它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具有活力的經濟形態之一；另一方面，台灣又被視為一個僵化的政權，它的領導人抗拒變革。

代。雖然大陸族群與台灣族群都是中國人，但這兩個群體在方言習俗方面卻有着顯著的差異。長期以來，這兩個群體衝突的主要根源在於，大陸族群在台灣居於統治的地位。全國一級的所有黨、政、軍高級職位最初都被大陸族群佔據着。在中央政府的三個經選舉產生的機構中——即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大陸族群自1946年在大陸經選舉成為中國所有省份的代表以來，一直佔據着絕大多數的席位。由於台灣一直自稱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從未正式放棄收復大陸的目標，因此，它就要為一個代表全中國的國民政府的永久存在提供正當的理由。基於此點考慮，政府機構就不能交給台灣族群把持。雖然台灣族群被阻絕了通往國家政治權力的道路，但國民黨的政策卻鼓勵他們去從事實業活動。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在商界發迹。例如，1974年版《台灣500工商人名錄》列舉了台灣500名商界大亨，其中68%為台灣人。1973年在台北市進行的一項調查的統計數字表明，在1968年到1973年期間遷入士林、北投等相對比較富裕的郊區的人當中，台灣人佔73%。從一種真正的意義上說，主要以台灣族群的經濟權力為表徵的社會異常的強大，足以同黨國的政權相抗衡。

到了70年代，大陸族群和台灣族群之間的權力分化已呈明顯之勢，前者控制着政治部門，而後者則操縱着經濟部門。從台灣經濟發展中受惠最多的都是經濟界的精英分子，他們都願意暗中支持政府用威權主義的方式達到增長和穩定的國民經濟目標。新興資本家階級對於把經濟實力轉用於政治活動沒有絲毫的興趣。或許，這

就是為甚麼所謂大陸人與台灣人之間的族群差異一直沒有轉化為階級衝突的一個原因吧，很明顯，台灣政壇上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階級衝突。台灣從1947年一直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能夠保持長達30年之久的政治穩定，這絕不是偶然的。

衝突中的社會和國家

國民黨的現代化方案把經濟發展置於優先的地位上，但這一方案也並非全然不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雖然全國一級的三個經選舉產生的機構中的職位直到60年代才向社會開放，但由於國民黨立志要按孫中山提出的建國目標把台灣建成一個模範省，因此它早在1950年就開始在省和省以下的級別實行地方自治。就如同土地改革一樣，地方代表機構的發展也必須贏得地方百姓的支持，這樣才能保證全島的政治穩定^②。

正如人們所期待的，國民黨在省和地方兩級選舉中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除村、鎮的選舉之外，國民黨候選人在省、市、縣三級選舉中一直都贏得了絕大多數的選票，在這幾級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贏得的選票一般佔全部選票的60%到85%不等。但是，省和地方選舉表現出了很高程度的政治競爭與政治參與。例如，1984年有1,500多名候選人（其中包括230名婦女）競爭907個席位。選民的投票率也很高：1964年有76%以上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到1977年，這個比例進一步上升到80%。

省和地方兩級選舉使一大批非國民黨的獨立政治人進入政壇，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成為重要的政治人物。

到了70年代，大陸族群和台灣族群之間的權力分化已呈明顯之勢，前者控制着政治部門，而後者則操縱着經濟部門。



台灣地方力量支持的《台灣政論》於1975年8月創刊，年底即被禁，圖為刊物的負責人，原載該雜誌的封底。

在此須着重強調的一點就是，自從50年代以來，省和地方兩級選舉業已成為台灣的老百姓和政客進行政治參與的一種方式。自1969年以來，在全國一級民意機構也開闢出了一些新的重要園地，供人們進行政治參與。由於1949年在大陸選舉出來的三個機構——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過去二十年裏相繼去世，因此，到了1969年，政府感到有必要增補一些新的成員。於是，台灣在1969、1972、1973、1976、1980、1983、1985和1989年舉行了一系列補充性選舉。在這些選舉中，雖然國民黨仍然贏得了約70%的選票，但獨立的或反對派的政客也贏得了30%的選票。（這個百分比在1991年12月新的國民大會選舉中仍然保持着，而新的國民大會選舉貫徹了政黨競爭的原則，是同李登輝推動的制度改革相適應的。）國民黨的一黨霸權正受到嚴重的挑戰，人們完全有理由把台灣70年代以後的政治制

度概括地稱為「一黨加獨立派」的制度^{②⑥}。但與此同時，國民黨在選舉中接二連三地取得勝利，這也給予其精英人物以充分的信心，使他們看到通過普選可以最有效地建立起國民黨的合法性。同樣重要的是，非國民黨政客或獨立人士在最近這些年來也日益感到，競選是在台灣取得政界要職、分享政治權力的一條保險而可行的途徑。

獨立人士有時又稱為黨外人士，由於國民黨不允許組建任何新的政黨，因此反對派的政客就只好成為「獨立人士」了。黨外人士是由兩個主要派別組成的一個異質性群體。「主流派」主張逐漸實行政治改革，贊成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和多黨政治。第二派有時也稱為「行動派」，這一派要比主流派更為激進一些，主張採取群眾運動的策略。他們贊成在國家制度方面實行徹底的台灣化，主張同大陸切斷所有的情感聯繫^{②⑦}。黨外人士的出現通常可以追溯到1977年的

國民黨精英人物看到通過普選可以最有效地建立起國民黨的合法性。非國民黨政客或獨立人士在最近這些年來也日益感到，競選是在台灣取得政界要職、分享政治權力的一條保險而可行的途徑。

中壢事件，那是一次因中壢市選舉中候選人涉嫌收買選民而引起的激烈的抗議示威運動。這一事件是三十年來反對派對國民黨政治權威的第一次公開挑戰，它象徵着一個日益趨於自主的社會對強大的黨國的抗拒。從政治和心理的角度來看，中壢事件成為台灣戰後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

的確，可以認為，從社會和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壢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台灣各派活躍的社會力量都希望進行政治參與，在國家的前途命運上有發言權。它們不斷地同僵化的政權發生衝突。」^②中壢事件以後，黨外人士通過報刊雜誌（《美麗島》雜誌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份）、運動和遊行示威，開始採取一種進攻的態勢，向黨國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在1979年12月10日人權日當天，黨外人士在台灣第二大城市高雄舉行了群眾示威，在這次後來被稱為「高雄事件」中，發生了暴力衝突，183名警察受傷（只有幾名示威者受傷，因為警察被命令不以武力還擊）。事件之後，政府逮捕並審訊了黨外的領導人以及其他60餘人，其中8人被判重刑。《美麗島》雜誌被迫停刊，因為在整個事件過程中，這份雜誌就如同一個政黨一樣在幕後起着組織領導的作用。輿論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人都支持政府的行動，因為異議分子被視為政治不穩定的根源，而政治不穩定會對公共秩序和經濟構成威脅^③。

但是，雖然國民黨的行動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但某些台灣選民仍有着一種根深蒂固的感覺，就是覺得自己被殖民化了，他們在情感上同情於諸如高雄八傑等被監禁的領導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殉道精神。在這種政治文化中，群眾聯盟、情感修辭

和對抗性的遊行示威對於政治溫和派來說成了在選舉中獲勝的手段。」^④白魯恂敏銳地覺察到了「大陸人」與「台灣人」之間的族群衝突的性質，他寫道^⑤：

在絕大多數民族的社會裏，社會差異都是根本性的，而政治則經常成為彌合差異的一個主要渠道，但台灣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台灣派與大陸派之間幾乎不存在甚麼社會距離，……唯一的衝突領域是在政治上，因此，在政治領域內為減少政治衝突而採取的種種措施對於社會的整合來說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決定意義。

在這方面，國民黨政府並不像評論者經常所認為的那樣僵化，事實上，它對迅速變化的政治現實是敏感而有反應的。國民黨顯然有意對各種社會勢力採取包容的政策，但與此同時也決心讓那種變化規範於現行的制度框架內。正如麥爾斯(Myers)所說的，「國民黨一方面更多地實行了多元政治，但在另一方面又決心控制政治競爭的參數，這樣就使得自己面對着一個頑固地採取敵對姿態的少數和一個支持的多數。」^⑥

自上而下的民主工程

很顯然，台灣政治上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來自於黨國的領導人。在這一方面，已故總統兼國民黨總裁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過渡中起着關鍵的作用。蔣經國如同其父蔣介石一樣在台灣政治系統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自1972年就任行政院長以來一直都深孚眾望。蔣經國從未同社會的變

國民黨顯然有意對各種社會勢力採取包容的政策，但與此同時也決心讓那種變化規範於現行的制度框架內。



台灣的民主探尋，可以說是無典範式的。圖為台北市的市長在市議會中作施政報告。

革脈動失去聯繫。他在經濟領域內大力推進現代化方案(包括雄圖大略的十大規劃)的實施，與此同時，他又通過推動「台灣化」進程而悄悄地開始了政治改革。台灣人不僅被任命在行政部門供職，而且還被選進了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就拿1983年的情況來說，台灣人在行政院、省和縣城三級決策機構中的代表比例分別佔40%、75%和100%。因此，除在全國一級民意機構中大陸人仍佔大多數之外，台灣人在省級機構已經佔據了絕大多數的職位，而在縣市一級機構中幾乎是清一色的台灣人。而且，由於國民黨已經適應了選舉，因此它向各級經選舉產生的機構提名的候選人絕大多數都是台灣人。今天，國民黨有200萬黨員，其中75%都是台灣人。蔣經國搞的「台灣化」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於1978年和1984年分別任命謝東閔和李登輝為副總統(1988年蔣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年又重新當選)。

的確，台灣的黨國實際上已經實現了「台灣化」。

事實上，早在1986年5月，黨國就顯然在蔣經國的授意之下同黨外人士進行了一次對話(所謂的「溝通」)，這標誌着國民黨實際上已經承認黨外人士為合法的競爭者。事實上，蔣經國在1986年3月舉行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就已經充分地顯示要使台灣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決心。他認為，實施黨國的立憲民主這一長期目標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完全憑借個人的力量說服了高層保守官員接受他的這一觀點。結果，他於4月9日任命了一個由中常委委員組成的12人工作小組，讓這個小組負責制定改革措施。10月15日，蔣運用他巨大的個人權力和威望使議案在中常委內部獲得通過，接受了工作小組提出的兩項關鍵性的改革措施。第一項是廢除戒嚴法，第二項是修改有關公民結社的法律，廢除對組建新政黨的禁令。這些

廢除戒嚴法和修改有關公民結社的法律，廢除對組建新政黨的禁令，蔣的民主改革並不能保證在台灣實行充分的民主，但它畢竟是朝着這一方向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

步驟標誌着中國歷史上民主發展的一次突破。必須承認，蔣的民主改革並不能保證在台灣實行充分的民主，但它畢竟是朝着這一方向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

黨外人士不顧國民黨的警告，於9月28日成立了民進黨，這比國民黨改革議案的通過還提前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在這次事件中，蔣經國決定容忍新成立的反對黨。於是，一個新時代從此誕生了，它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宣告了一黨政治的結束。蔣經國在推進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所起的強大的個人領導作用再明顯不過地證實了戴爾蒙德(Larry Diamond)的下述論點：「民主化的最有利的發展就是國家領導人對這一過程的堅定承諾」^③，戴爾蒙德的這一論點特別適合於台灣的情形。

在台灣民主化過渡中，有許多個人的或非個人的力量在不同層次上朝着不同的方向起着作用，其中，黨外人士向政治權威挑戰、要求組建反對黨的決心給國民黨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台灣民主工程的真正設計者是蔣經國這位卡里斯瑪型領導人。他講究實效，充滿自信，因此能夠以妥協的方式包容和回應反對派的觀點和要求：不僅如此，他還實實在在地幹事，強而有力，從而克服了黨國內部保守勢力的障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一個威權型國家的領袖運用其威權權威策劃了民主的突破，並將這種突破予以合法化。

但是，儘管蔣經國在黨國中的作用巨大，我們卻不能忽視了國民黨領導層中銳意改革的自由派的實質性參與，尤其不能忽視了那些在70、80年代脫穎而出的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人

在台灣民主化過渡中所起的作用。黨內銳意改革的精英分子，無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似乎都相信，承認反對黨的存在不僅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是可取的。蔣經國並非孤軍作戰，他的民主開放的政策在黨國領導層中有相當多的支持者。

政治文化：連續性與變化

在台灣，國民黨自命為中華文化的維護者，這與中共在大陸的所為正好相反。近幾十年來，中共一直都試圖系統地用馬列主義來取代儒學。國民黨所崇奉的三民主義是融會了中西兩種價值觀念的混合體，是黨國的官方意識形態，自國民黨遷到台灣以來，它一直都是大眾教育和生活的一部分。對教育過程的研究表明，台灣的學校在教育方法上是以權威群體為中心的，帶有濃重的家長制的色彩。儘管學校所做的社會化工夫究竟取得了幾分成功頗值得懷疑^④，但70年代初的一項調查表明，93%的學生認為，尊敬長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美德」，只有13%的學生認為多數原則、定期選舉、保護異端、多黨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徵^⑤。

上述調查表明，雖然自清末以來，尤其是「五四」前後，儒家思想受到來自各方面思潮的猛烈抨擊，但是在台灣的中國人的態度和價值觀仍帶有儒家思想的烙印^⑥。這樣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很難被認為在本質上是民主的。但是，半民主或親民主的觀念在儒家思想中並非完全沒有。眾所周知，孟子就直截了當地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⑦這類儒家

儘管蔣經國在黨國的作用巨大，我們卻不能忽視了國民黨領導層中銳意改革的自由派的實質性參與，尤其不能忽視了那些在70、80年代脫穎而出的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人在台灣民主化過渡中所起的作用。

思想為人們所廣泛接受，已經成為儒家政治學說中牢固的一部分，被稱為民本思想。一個對1949年到1974年期間台灣政治變化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台灣民主文化的演進。它指出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導致了一種「實質性的」民主，也就是說，以人民利益為宗旨的政府政策已經使全體人民得到了實惠。「台灣的人民對民主並沒有堅定的信念，所以他們並不是在一切場合都按民主的程序行事。他們相信，各項政策應有利於人民，但他們似乎比較喜歡那種威權式的、簡便的決策方式，而不太喜歡開放的政治競爭過程所要求的法治。」^③很顯然，直到70年代初期，台灣人民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如果這些觀察是站得住腳的話，那就意味着，至少到70年代初期，台灣人民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一直都適應於並支持着國民黨政府的以人民利益為導向的威權統治。

儘管文化總是抗拒變化的，但二十世紀的台灣已不再處於韋伯分析過的那種儒學的統治下了。韋伯所說的儒學或許可以稱為「帝制儒學」，它是國家意識形態與一套具有戰略意義的體制（包括文人學士、科舉制度，尤其是帝制官僚制）的複雜混合體。在後儒學時代，儒家那一整套具有戰略意義的帝制體制已經全部瓦解了。顯然，最重要的新的政治制度就是1946年頒佈的憲法，其中的指導原則來自於西方民主思想而非儒家思想。這部憲法毫不含糊地吸收了「人民主權」的概念。這一概念還被寫進了公民教育的教科書中。

台灣的階級結構自70年代以來經歷了急劇的變化。從1970年到1980年，中產階級在全體人口中所佔的比

例從21.9%提高到31.5%^④。屬於這個階層的人數目前約為600萬。更有意義的是，有幾項研究不斷地表明，台灣50%的選民都自認為屬於中產階級。除飛速的工業化之外，台灣中產階級人數激增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的迅猛擴大。1970年，高等院校錄取的學生人數為203,473，到1988年則達到442,648，比1970年增加了一倍。截止到1987年，台灣高等院校畢業生的總人數達到140萬。高等院校在教育方法上完全不同於中小學，大學生所接受的主要是自由民主的觀念而不是儒家的價值觀，因為許多大學教師都受過西方教育。在別的地方，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既有溫和保守的也有自由的，他們贊成漸進而穩妥的改革，但新興中產階級則不然，他們表現出對政治改革和社會進步的更高的期望。毫不奇怪，經驗顯示，中產階級的興起是同台灣政治多元化的形勢密切相關的^⑤。

過去十幾年裏發生在政治領域中的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78年，57.1%的選民從不談論政治，但到1985年，這個百分比下降到32.1%^⑥。自1977年的中壢事件以來，老百姓日益關心公共事務和政治事務。胡佛和游盈龍於1981年2月對台北市選民的選舉動機所進行的全市規模的調查^⑦，充分地顯示出老百姓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的變化。

圖表1表明，有三分之二的選民提到，他們之所以參加選舉，是為了「行使公民權利」或「履行公民義務」。更為重要的是，分別有47.4%和43.9%的選民指出「行使公民權利」或「履行公民義務」是他們參加選舉的最重要的原因。這些統計數字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台灣人已經有了公民角色

在後儒學時代，儒家那一整套具有戰略意義的帝制體制已經全部瓦解了。顯然，最重要的新的政治制度就是1946年頒佈的憲法，其中的指導原則來自於西方民主思想而非儒家思想。

圖表 1

選民參加選舉的動機 ¹	人數	百分比(%)	參加選舉的最重要的原因 ² (%)
行使公民權利	519	68.8	47.3
盡公民義務	498	66.0	43.9
表達自己的觀點	247	32.8	15.5
支持他(或她)所喜歡的候選人	228	32.8	12.2
影響政府政策	181	24.0	11.9
受黨派或其他政體群體的指導或勸告	98	13.0	5.6
受家庭成員或親戚的敦促	79	10.5	5.6
受居委會的敦促	49	6.5	2.7
受他(或她)所屬的組織的敦促	38	5.0	2.3
支持他(或她)所認識的候選人	28	3.7	0.9
受他(或她)工作單位同事的敦促	14	1.9	0.5
其他	15	2.0	1.7

(1) 被調查者對「參加選舉的原因」可能給予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回答。

(2) 被調查者可能列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項目來作為「參加選舉的最重要的原因」。

N=747

資料來源：胡佛與游盈龍：〈選民的投票動機〉，《社會科學論叢》(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卷33(1985年10月)，頁6。

的概念，對於政治活動也開始有了參與意識。近年來選舉中出現較高的投票率(約為65%到70%)，也可以從中得到部分說明。上述調查還表明，有四分之一的選民感到他們能夠影響政府的政策，約有12%的人說這是他們參加選舉的「最重要的原因」。一個人感到自己能夠影響政府的政策，這說明他擁有政治效率的意識。就這個實例來說，24%的選民具有阿爾蒙德和維爾伯所說的「公民能力(citizen competence)」^③。應當承認，同阿爾蒙德和維爾伯在美國和英國所發現的百分比(美國是66%，英國是56%)相

比，上述百分比還是相當低的，但卻達到了意大利的水平(27%)^④。

根據胡佛於1985年所進行的另外一項調查^⑤，我們看到，台灣人民有很高的「屬民能力(subject competence)」^⑥，但其「公民能力」則相對較低。多達85%的人(20歲到70歲之間)說他們有權向政府提出異議：他們有權要求政府官員更加關心人民的疾苦、滿足人民的需求；他們有權對政府的各項政策發表不同意見，等等。但只有13%的被調查者感到他們有權干預政府，影響政府的施政、人事等。這些調查結果表明，80年代初

台灣的政治文化是一個高「屬民能力」與低「公民能力」的混合體。不過，有趣的是，在被調查者當中，有相當多的人(42.8%)感到他們有權影響議會制定規則的過程。胡解釋說，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議員不同於官僚，他們是由民眾選舉產生的。胡得出結論說，台灣的選舉業已成為政治社會化的一個機制。這一觀察再一次證實了魯斯托的論點：信仰與行動、民主價值觀與民主實踐之間存在着交互的影響。就目前討論的這個實例來看，台灣先在地地方和省兩級，然後在全國一級所進行的長達四十年之久的選舉實踐逐漸在政客和公民中間培養起了一種民主參與和民主競爭的「習慣性態度」。可以說，這種民主的「習慣化」業已成為政治價值觀與態度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⑦。

圖表1表明，除了行使公民權利或履行公民義務之外，選民參加選舉主要是為了某一外在的目的，如為了表達自己的觀點(32.8%)，支持他(或她)所喜歡的候選人(30.2%)，特別是影響政府的政策(24%)。換句話說，選舉被視為實現政治目的的一個工具。因此，可以說，相當數量的選民都對選舉持一種工具理性的態度。誠然，某些人的選舉行為也受到社會和環境勢力的影響，例如，有些人是迫於黨派和其他政治團體(13%)、家庭成員和親戚(10.5%)等的壓力而去參加選舉的。但這類選民的比例相對是比較低的，這表明，在台灣正在出現的政治文化中，亨廷頓和奈爾遜(Nelson)所說的「動員性的參與」(指不是出於選民自己的動機，而是迫於其他壓力的參與)正在逐漸減少，換言之，在台灣，政治參與正在日益成熟和趨於「自主」^⑧。

胡和游的調查結果中還有一點頗值得注意：對選舉所持的工具理性態度是同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數和教育水平呈正相關的。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讓人感到希望的現象，因為台灣的教育和工業化已經得到了不斷的提高和發展。

基於上述同一項調查所得的數據，胡佛還對選民對政治問題的態度進行了分析，這一分析進一步說明了台灣正在出現的政治文化的某些特徵。選舉情況表明，在選民當中，58.9%的是針對候選人，38.7%是針對政治問題，21%是針對政治組織，17.1%是針對個人關係，10%是針對社會關係，9.8%是針對其他因素^⑨。在各種類型的選民中，針對問題的選民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的態度向我們說明了有關變化中的政治文化的更多的情況。據發現，這些選民中有42%支持那些以提高國家國際地位，鞏固領導中心，維護政治治安為重點的問題，另外33.5%支持那些以維護社會秩序，澄清吏治為重點的問題，只有18%的人支持那些以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為重點的問題。依照這些數據來判斷，台灣絕大多數的選民在心理上都傾向於與政治系統相認同，希望能夠維持現狀。他們不贊成任何種類的激進的社會政治變化。這一觀察得到了魏鏞的研究的證實，按照魏鏞的意見，台灣的民意結構是「溫和支持型」的^⑩。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台灣政治文化的演進表明它已經明顯地脫離了儒家思想，但後者的影響還遠遠沒有消亡。公民文化的某些特徵正在生根發芽，或許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種民主型文化正處於生成的過程之中。

台灣絕大多數的選民在心理上都傾向於與政治系統相認同，希望能夠維持現狀。他們不贊成任何種類的激進的社會政治變化。

無典範式的民主探尋

長期以來，現代化與民主的關係一直都是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們關注的中心。就台灣的情況來說，在現代化的早期階段，直到70年代中期，國民黨的導向的威權統治從未遇到過任何全社會的、對統治結構構成威脅的政治抗議或挑戰，國民黨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創造了一個十分成功的、公平的經濟格局。那一時期人們的政治價值觀和態度似乎是與以民為本的威權主義相容的。但是，到了後來，經濟發展的成功造就出了包括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在內的眾多結構性力量。中產階級開始對台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發生影響。一種同民主相適應的新型政治文化也發展了起來。此種政治文化的興起不是工業化的因，而是其果。誠如白魯恂所說的，「台灣可能是下述理論的一個最好的例證：經濟的發展必定會使人們產生一種民主的偏好，造成多元化的滾滾浪潮，所有這一切最終將會削弱發展中國家共同的威權主義統治的基礎。」^⑤就此而論，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似乎的確存在着一種經驗性的相互關聯，李普塞特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是，如果沒有自上而下的民主工程（尤其是蔣經國這位卡里斯瑪型領袖所發動的民主工程），那麼台灣就不可能那麼順利地步入到民主的軌道。的確，正是蔣經國幫助促成了台灣的現代化，並由此產生出種種結構性的民主力量，然而就連他本人也不能免於這些民主力量的衝擊。他於1986年12月作了一個很有名的講話，宣佈蔣家成員「不能也不會」成為他的繼承者。他說這番話絕不是偶然的。

台灣的民主化發生在一個獨特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沒有甚麼先例可供依循。這是一種英雄色彩的、無典範式的民主探索。台灣的事例也不能被當作民主過渡的一個典範。

在《台灣奇迹中的國家與社會》這本出色的論著中，高棣民得出結論說：「台灣的發展是由眾多獨特的因素推動起來的，這就使得台灣的經驗不可能成為一個可行的模式。」^⑥就台灣的現代化而言，情況確是如此，就台灣的民主化而言，情況就更是如此了。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中沒有一個民主過渡的典範，台灣的民主化發生在一個獨特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沒有甚麼先例可供依循。這是一種英雄色彩的、無典範式(non-paradigmatic)的民主探索。台灣的事例也不能被當作民主過渡的一個典範^⑦。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台灣的事例同那些從威權主義／獨裁主義過渡到民主的國家沒有絲毫關係。畢竟，對現代化的研究既要注重特殊性，也要注重普遍性。台灣事例中除那些獨特的、不能複製的因素之外，其中一般特徵對於目前亟需的民主過渡典範之建構來說具有很大的價值。首先，在台灣的事例中，政治和經濟是緊密關聯、相互作用的。黨國是一個「受到抑制的」政治中心，它在以人民利益為導向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由於經濟發展的不斷成功，再加上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在台灣出現了種種強大的結構性力量，其中包括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新興的、不斷擴張的中產階級強烈地認同於現行政治體制，但也希望溫和地、逐步地進行民主改革。總之，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造就出了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這個社會雖然對黨國並無敵意，但卻十分強大，足以向黨國施加壓力，使其更加兢兢業業地去促進人民的利益。人民在各種選舉中，尤其是在70、80年代的各種選舉中對黨國的不懈支持使國民黨領導人感到安全並有

信心參加到競選中去。同樣，政治挑戰者也發現，競選是權力分享的一個可行的、有效而安全的途徑。從一種重要的意義上來說，政治競爭者已經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感覺到有必要堅定不移地尊重競賽規則，亦即達爾(Robert Dahl)所說的「共同安全的體系」⁵⁴。

就台灣的情況來說，政治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純的附屬現象。政治系統雖然明顯地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卻一直都是一個自主的力量。70、80年代朝着政治發展方向的持續努力，尤其是1986年所採取的重大步驟，都是由政治中心推動起來的，其間蔣經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理論上說，高層領導人的重要性不應淹沒到結構決定論這一社會學論證中去。為了充分地理解台灣的民主過渡，「發展的政治學」必須同「發展的經濟學」一道平行地、自主地加以評價。

的確，台灣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人民的政治價值觀和態度的重要變化。這種新的政治價值觀和態度顯示出明顯地脫離了儒家思想的「屬民文化」的某些特徵。我們的研究無疑表明，經濟的發展與政治民主的興起之間有着一種經驗性的關聯。但我們不應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台灣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地方和省兩級選舉實踐是平行於並獨立於經濟發展的，這種選舉實踐業已把民主參與和民主競爭的價值觀和競賽規則「制度化」了。這有力地證明了，魯斯托所提出的「習慣化」概念乃是民主文化變化的一個重要源泉。

註釋

① Peter Berger: "Secularity — West and Eas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Kakagakuiv University Centennial Symposium on Culture Ident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September 11–13, 1983).

② Herman Kah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London: Croom Helm, 1979).

③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34–35.

④ 我在〈東亞經濟發展的文化詮釋：論香港的理性傳統主義〉一文中對此有所討論。見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152–69。

⑤ Alexander and Ya-li Yu: "Future Domestic Developmen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sian Survey* 25 (October 1985), pp. 1075–95; Yang-sun Chou and Andrew J.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27 (March 1987), pp. 277–99.

⑥ Ronald H. Chilcot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p. 79–109.

⑦⑧⑨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 p. 223; p. 233.

⑩ Robert E. Ward and Dankwart Rustow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urk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5.

⑪ Gabriel L. Almo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ssays in Heuristic The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chs. 5 and 6. See also 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 Weiner and S.P.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

台灣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地方和省兩級選舉實踐是平行於並獨立於經濟發展的，這種選舉實踐業已把民主參與和民主競爭的價值觀和競賽規則「制度化」了。

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 449.

⑩ Wolfgang J.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4), ch. 5. 韋伯對現代化所持的悲觀觀點尤其在 Richard Bernstein 所編 *Habermas and Modernity* 一書中得到討論並受到批評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p. 1–66.

⑪⑫ Dankwart E.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70), pp. 337–64; pp. 358–61.

⑬ Jose Casanova: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Reflections on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al Research* 50 (Winter 1983), pp. 929–73.

⑭⑮⑯⑰⑱ 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E. Sharpe, 1986), p. 59; pp. 67–68; p. 90; p. 132.

⑲ 「受到抑制的政治中心」這一概念是由 Thomas Metzger 提出的。這一概念指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關係，其表現形式為，一個分化的、私人化的社會制約着政治中心的權力。「受到抑制的」政治中心一方面同完全「從屬性的」政治中心形成對比，另一方面也同「不受抑制的」政治中心形成對比。Thomas A. Metzger: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8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June 8–11, 1989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⑳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Government Agricultural Strategi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81), pp. 101–64.

㉑⑳㉒ 魏鏞：《向穩定、和諧革新的道路邁進：從六次民意調查結果看政治發展趨勢》(台灣：政府出版物，1986年5月5日)。

㉓ 蕭新煌：〈台灣社會的發展經驗，

從殖民主義到資本主義〉，該文是向1987年12月24日至26日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召開的「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討論會提交的論文。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的國家裏，基尼系數一般在0.50到0.70之間。處於0.20到0.35之間的指數表示收入分配相對比較公平。(零表示絕對的平均，1表示絕對的不平均。)

㉔⑳㉕⑳ John F. Coop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Hungdah Chiun (ed.): *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 (New York: Praeger, 1979), pp. 37–73.

㉖ Neil H. Jacoby: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6), p. 11.

㉗ Douglas Mendel: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114–217.

㉘ Ming-min Peng: *A Taste of Free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2).

㉙⑳ John, Mingsien Lee: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1949–1974: A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Democratic and Integrative Change with Focus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1975), pp. 87–92; pp. 148, 211.

㉚ 見⑤, Alexander and Ya-li Lu, pp. 1089–91.

㉛ 見⑬, 頁130。Gold把台灣的政治體制說成是「僵化的」，在我看來，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準確，此點將在本文的後面詳述。

㉜ John F. Cooper: "Taiwan's Recent Election: Progress Toward a Democratic System", *Asian Survey* 21 (October 1981).

㉝ Chou and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p. 278.

㉞ Ramon A. Myers: "Political Theory and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Survey* 27, No. 9 (September 1987), p. 1018.

③③ Larry Diamond: "Beyond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 Strategy for Democratiz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89), p. 151.

③④ Sheldon Applet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Educa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16 (August 1976), pp. 704-16.

③⑤ 參看杜維明, "Confucianism: Symbols and Substance in Recent Time", in R.W. Wilson, A.A. Wilson and S.L. Greenblatt (eds.): *Values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9), pp. 21-51.

③⑦ 《孟子》, VIIb. 14.

③⑨ Yow-suen Su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in Taiwan" 未刊稿(Sociology Dept.,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6). Quoted in Hsiao: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ce of Taiwan," p. 5. 中產階級指自己從事經營的企業家和經理, 以及工業和商業部門的專業人員。

④⑩ Li Wen-lang: "Structural Correlates of Emerging Political Pluralism in Taiwan", 本文是向1987年9月3日至5日召開的「台灣: 一個新興工業化社會」國際討論會提交的論文。

④⑫ 胡佛和游盈龍: 〈選民的投票動機〉, 《社會科學論叢》33(1985年10月), 頁34,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我對台灣變化中的政治文化的分析得益於他的研究, 但在解釋上稍有不同。胡佛教授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的許多著作, 謹此表示感謝。

④⑬⑭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pp. 168-85; p. 173.

④⑮ 胡佛: 〈台灣地區民眾對政治參與的態度: 系統功能的權力價值取向〉, 本文是向國立台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於1987年8月28日至30日舉辦的「台灣社會變革之基本研究討論會」提交的論文。

④⑯ Almond和Verba給「屬民能力」的定義如下: 「屬民能力是指一個人在規則之下意識到自己的權利, 而不是

指一個人意識到要參與制定規則」, *The Civic Culture*, p. 169.

④⑰ S.P. Huntington and J.M.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④⑱ 這些數字的總和超過了100%, 因為選民對「你為何投他(她)的票?」這一問題作出的回答可能不止一個。見胡佛: 〈選民的政見取向: 結構、類型和運作的分析〉, 《社會科學論叢》34(1986年6月),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

④⑲ Samuel Huntington認為, 創造民主國家的種種環境之特殊組合不大可能再度出現。參見他的"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eptember 1984), pp. 193-218.

④⑳ Robert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6.

劉鋒 譯

金耀基 浙江天台縣人, 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及社會學系講座教授, 1977-1984年間曾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等職。金教授著述甚豐, 影響很大, 其中包括《從傳統到現代》、《現代化與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編著有《香港的社會生活與發展》(英文), 此外, 有多篇論文發表於學術刊物。